

Hanspeter Kriesi,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second edition 2003 of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1995, 2003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4)第6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瑞士] 克里西等著; 张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5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5366-7735-9

I. 西... II. 克... 张... III. 社会运动—对比研究—西欧 IV. D75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5436号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

XIŌU XINSHEHUI YUNDONG—Bǐjiào Fēnxī

[瑞士] 汉斯彼得·克里西

[德国] 鲁德·库普曼斯

[荷兰] 简·威廉·杜温达克

[美国] 马可·G. 朱格尼 著

张峰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陈兴芜

责任编辑: 杨亚平 责任校对: 郑葱

封面设计: 金乔楠 版式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8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23) 8859355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22.75 字数: 297千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 88593553 转 9005

目 录

导 论 / 1

上编 一般概念和基本结果

- 第一章 民族分裂结构 / 21
- 第二章 体制结构与主导战略 / 45
- 第三章 联盟结构 / 72
- 第四章 社会运动类型与政策领域 / 101
- 第五章 抗议浪潮的动态 / 132

下编 解 释

- 第六章 核能源问题的政治构建 / 169
- 第七章 运动和市场之间的同性恋亚文化 / 189
- 第八章 抗议的跨国扩散 / 208
- 第九章 新社会运动的结果 / 234
- 结语 / 264
- 附 录: 报纸数据 / 278
- 参考文献 / 301



序 言

本书是持续七年多之久的合作努力的结果。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项目是由汉斯彼得·克里西在 1987 年发起的。那时，他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集体政治行为系工作。简·威廉·杜温达克是同年该系为这一项目而聘用的第一位助手。一年后，在阿姆斯特丹社会研究学院的帮助下，鲁德·库普曼斯参加了这一项目，该学院为他提供了助教职位。汉斯彼得·克里西在迁移到日内瓦大学后，得到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两笔研究资助，使得马可·朱格尼在 1989 年参加了该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这一项目还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大学普通政治科学系和政治与社会文化科学学院、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 (NOW) 和日内瓦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支持。没有各方面的这些机构给予我们的慷慨支持，我们决不可能进展现在这样的程度。

在进行这一项目的过程中，关于四个特定国家的卷本已经完成——我们对选来进行比较的四个国家每一个都有一卷：首先，简·威廉·杜温达克、海因-安东·范·德·海伊登、鲁德·库普曼斯和卢克·威曼斯(1992)编辑了关于荷兰的一卷，其他几个作者也为此做出了贡献。然后，完成了三本哲学博士论文：简·威廉·杜温达克(1992, 1994b¹)写了关于法国的一卷，马可·朱格尼

¹本书正文所引文本仅标明作者和出版年份，关于所引文本详情可查本书所附“引文索引”。——译者注

(1992)写了关于瑞士的一卷,鲁德·库普曼斯(1992a)写了关于德国的一卷。所有这些个人的研究都具有同样的总的概念框架,这个框架是我们在合作的岁月里在阿姆斯特丹和日内瓦的许多联合工作站提出并讨论过的。本书是试图把以前著作关于特定国家的发现整合进一种系统比较的整体中。本卷的所有章节都具有同样的总的观点,这是我们中间在几次场合深入讨论过的。然而,它们是由我们通过四个变化的组合来写作的,最终的责任要由每一章的特定作者来承担。需要具体说明的是,简·威廉·杜温达克写了同性恋运动的第七章,并参与写作第一、四、六章以及结语。马可·朱格尼写了关于扩散和结果的最后两章(第八和九章),合写了第四章和导论。鲁德·库普曼斯是关于抗议浪潮的动力第五章和技术性附录的作者,并参与写作第二章和第六章以及结语。汉斯彼得·克里西写了关于联盟结构的第三章,合写了导论和第一、二章。

除了机构的支持而外,我们还得到了来自一些同事和朋友的支持。我们要向译解者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帮助我们对法国、德国和荷兰的事件进行译解。我们得益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三位评阅人——伯特·克兰德曼斯、克里斯·鲁茨和悉尼·塔罗,他们的评论对修改我们的手稿很有帮助。在形成我们的观点过程中,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几个工作站的许多同事就社会运动进行了有刺激

性的讨论,使我们获益匪浅。最后,我们还想感谢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同事海因-安东·范·德·海伊登和卢克·威曼斯,日内瓦大学的弗洛伦斯·帕西,他们在我们共同项目的几个阶段和我们讨论了概念和结果,另外也使我们感到快乐。同在日内瓦或阿姆斯特丹他们中的这个或那个人在一起,我们不仅努力工作,而且还一起享受到美妙的徒步旅行和愉快的餐饮。

汉斯彼得·克里西

鲁德·库普曼斯

简·威廉·杜温达克

马可·G·朱格尼

于日内瓦、柏林、阿姆斯特丹、纽约

1994年5月

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 1952 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斯大林文选》下册，第 595 页）。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力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

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说，在这种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选集》第3卷，第3版，第191~192页）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

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 1981 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思想年谱》第 143~144 页)而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正如《世界报》观察到的，1983年10月22日将载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史册^①。凌晨4点，第一趟专列到达波恩，带来了和平示威运动的参加者。这次运动是自两年前动员反对在德国部署巡航和潘星II型导弹以来，首都所见到的最大的和平示威运动。早晨，示威者排成了长队，从巴特戈德斯贝格附近的剧院广场一直排到核大国——前苏联、美国、中国、法国、英国、印度、南非——的大使馆。中午，在晴朗的天空下，一列长长的火车从巴特戈德斯贝格转回到波恩。下午2点钟，众多的人群集聚在波恩的霍夫花园。估计有25万到50万人参加了德国和平运动发起的这次给人印象深刻的示威活动。这次事件没有因最轻微的小事故而暗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因为被认为是当日明星演说家的威利·勃兰特得到了人群并不热情的对待。在持久的谈判之后，组织者允许这位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向集会发表讲话。但许多参加集会的人并没有忘记，正是这位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曾同意了北约组织在德国领土上部署潘星II型和巡航导弹的决定。

波恩的这次集会不是这一天的唯一事件。在整个德国，和平运动都在示威抗议核武器。在德国南部，和平运动组织了22万示威者的

导

论

^①《世界报》，1983 10 25。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

New Social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队伍，从斯图加特—韦亨根美国空军在德国的司令部连到了乌尔姆附近的兵营，有百余公里长。有如此之多的参加者的数目（超过了所有预期），这支队伍便能排到慕尼黑，即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所在地，该党曾殷勤地维护北约组织的双轨决定。此外，这个周末的事件是以一个动员很大数目的人民的行动周为先导的。说不清有多少的职业集团已经向一般民众发出了呼吁——他们中间有“追求和平的艺术家”、“追求和平的建筑师”、“追求和平的法官和检察官”。很少有哪一个职业集团不发表声明。在整个德国，学校也参与了这个和平周。还发生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如在法兰克福组织了“渴望罢工”，表明人民“渴望和平”。总的说来，有二三百万人参与了这个和平周事件。新闻杂志《镜报》谈到了联邦共和国不得不面对的这次最大的挑战：以前从未有过哪一个运动使当局受到如此的压力^①。这场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民主党（SPD）来说是特别深远的，《镜报》坚持认为，该党已经完全“拉封丹化了”。换言之，社民党正在效法它的一个挂名首脑奥斯卡·拉封丹，拉封丹已经站在了和平运动一边，正要成为 1990 年全国大选时该党竞选总理的候选人。

如果德国的这次挑战是最重要的挑战的话，德国也不是在 1983 年 10 月这个周末被和平运动所震动的唯一国家：在罗马有 50 万人抗议核武器（共产党的联盟声称，他们计算有 100 百万人）；在伦敦中心有 25 万人从泰晤士河游行到海德公园，这是英国支持核裁军阵营（CND）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布鲁塞尔聚集了 12 万（据警察估计）到 40 万人（据组织者声称），在两年当中布鲁塞尔从未见到过这么大规模的示威；10 万多西班牙人（根据最可信的估计，正如《世界报》所强调的）在马德里示威显示他们与国际阵线的团结。一周后，荷兰运动在海牙发起了它最大的示威活动：有 55 万参加者，这一事件甚至比该运动两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组织的一次示威活动规模更大。甚至在瑞士，对西

^①镜报，1983 10 17

欧部署巡航导弹的抗议也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尽管这个中立国家并不直接受北约组织决定影响;11月5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发生的一次最大的示威活动中,得到50多个组织支持的3万~4万人以示威证明他们与国际阵线的一致。

法国却显示出是一个异常的例外。在它的第一阶段,《世界报》谈到了法国“软弱的动员”。在巴黎,在所说的这个周末举行了两次单独的示威活动:一次在星期六,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和平运动、共产党(PCF)和最大的工会(共产党的法国总工会)组织的;一次在星期天,是由支持欧洲核裁军委员会(CODENE)、第二大工会(CFDT)和新左派的主要政党统一社会党(PSU)组织的。这两次事件只吸引了数目相对较少的人:星期六有1.5万人到2万人游行;星期天有7000到8000人排成了一支队伍,从加比利尔大街上的美国大使馆延伸到兰尼斯大街上的苏联大使馆;星期天下午大约5000人集会在巴士底狱。这最后一次集会的主要演讲人挑战社会党和社会政府,因为后两者都敌视和平主义的运动。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动员甚至更为软弱:在马赛、里昂、格勒诺布尔和里尔大约动员了2000人,在南希和布尔日大约1000人,在法国飞机制造业的基地图卢兹有200人。

从本书采取的比较的观点来看,惊奇的主要不是在整个欧洲和平运动动员的巨大成功,而是它在法国的相对弱势。在1983年10月,法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出来游行示威呢?读者可以援引法国历史的或文化的特殊性,来解释他们的例外。然而,在最一般的层次上,这一论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前面提到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的和文化的特殊性,但尽管有这许多的特殊性,除了法国,它们都大规模地参与了和平运动的抗议。在更特别的层次上,讲历史的或文化的根源可能是更有价值的。因此,人们可以提出,这个庞大民族同北约组织保持一种有距离的关系的传统,因而并不直接为北约组织的双轨决定所涉及。但正如我们注意到的,不具备北约成员国关系并不妨碍瑞士加入国际反巡航导弹的阵营。也许人们还可以考虑,法国作为一个核大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

New Social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国，选择保持它自己的打击力量，因而法国一般很少倾向于抗议核武器。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怀疑这种推理：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大国，但并不妨碍英国爆发大规模示威反对部署巡航和潘星 II 型导弹。人们仍可以认为，也许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法国作为一个核大国，选择保持对北约的独立性——解释了它的公民的反常行为。解释这一结合的论点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英国不管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都放弃了它独立的核武器的能力，以便更廉价地选择购买美国的核武器。尤其是，正是美国控制的巡航导弹被安置在英国的土地上（例如，在格林汉康芒）。因此，法国的核威慑已经——并被看做——比英国的核威慑更是真正独立的。根据这一更有辨别力的论证^①，英国出于民族主义的理由，会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部署美国导弹，而法国却不会有这样的刺激去进行动员。

尽管我们不想抛弃这类论证，但我们相信，人们对这些运动政治学的解释是应该怀疑的，因为这些解释没有考虑到社会运动的动员发生的民族政治背景更特殊的方面。一直存在着足以进行动员的理由——例如，在缺乏民族主义理由的情况下，法国本是能够进行动员以显示他们的国际团结，就像传统上中立的瑞士所做的那样。但动员并非总是唾手可得的，如果它是唾手可得的，它也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我们的论点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同一个既定国家的议会和院外舞台的常规政治紧密相关。我们将力图表明，通过关注这一关键的联系，我们将有更好的准备去应付我们发现的西欧社会运动的动员类型方面的引人注目的国家间的变体。

即使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还猜想，在 1983 年 10 月下旬，法国存在两种竞争的和平示威决不是偶然的事，而且我们认为，当时法国和平运动脆弱的动员能力也许要拿出许多来对付它的共产党的分支和新左派的分支之间的分裂。我们还提出，缺乏法国社会党人对这一运动

^①这一论证是由我们的一个评论者作出的。

的支持——与德国、荷兰和瑞士这样的国家中社会党人和和平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盟形成强烈对比——决定性地加剧了它的比较弱势。此外，根据我们为本书所采纳的观点，我们还力图解释随着国家政治背景的变化而出现的动员类型的变化。例如，如果不考虑到有关国家的政治背景，就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和平运动的动员就不再是少有的软弱，为什么正是现在荷兰和平运动却转而表现出比较缺乏动员能力。事实上，在1991年1月，法国和平运动比较强有力地动员起来反对波斯湾战争，正像德国运动所做的那样。相比之下，尽管荷兰像德国或法国一样严重被卷入这场战争中，却很难动员起来（杜温达克和库普曼斯 1991a）。

为了说明社会运动的动员，我们强调政治背景，这是和运动研究领域最近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相一致的。在这一研究领域最近的发展中，有种观点有一定份量，就是认为社会变化的过程通过现存大国关系的重建，间接地冲击着社会抗议。研究社会运动的政治进程方法（麦克亚当 1982）所推进的这一观点反对经典的集体行为理论——如“大众社会”或“相对剥夺”的理论，这些理论强调社会变化和抗议之间的直接关系。最近，几个作者为政治背景的分析提出了分析工具，政治背景传递结构性冲突对于公开的运动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机会结构（POS）的概念已经成了这些分析的核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辛格（1973）引入的，在艾辛格看来，它意味着再现一个政治制度向社会运动所表达的挑战开放的程度。特别是基舍尔特（1986）、塔罗（1983、1989b、1994、1995）、德拉·波塔和鲁赫特（1991、1993）都努力地阐释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已经证明对于研究集体行动是非常有用的。在塔罗的（1995）恰当的论文中，政治机会结构涉及到所有“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的信号，这些信号要么鼓励，要么挫伤他们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去形成社会运动”。

导

论



动员的政治背景的一种模式

根据我们在本书中将使用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分析,政治机会结构是由四个因素构成的:国家的分化结构、体制结构、主导战略和联盟结构。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特定的政治分化结构决定的,政治分化结构进而又根源于一个既定社会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正如布兰德(1985: 321)所提出的,政治分化或者说既有政治冲突的现存构造,对运动政治舞台的新来者的动员产生重要的制约。

其次,我们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有形的体制结构。政治机会结构的这一方面,是基舍尔特(1986)使用这一术语的核心,它区别开了政治制度的有形的“投入”和“产出”结构。按我们的方式,有形结构的这两个方面完全是第二位的,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把塔罗(1994)叫做“统计学家的”方式的东西包括进我们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中。

再次,不像以前的对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分析,我们想强调社会运动动员的有形的体制设施同政治权力当局处理它们时沿用的主导的无形战略之间的区别。进行广泛的定义,政治体制不仅包括支配一个国家的政治的有形规则,而且还包括无形的程序和操作的实践(霍尔 1986: 19)。我们采纳这种广泛的政治体制的概念,并将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有形的规则和无形的实践在国家间可以是相当独立地变化的。

最后,我们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还包括了动员运动的政治背景不怎么稳定的因素——一种政治制度的力量构造的某些方面,我们用联盟结构一词来概括。这些是塔罗(1989a, 1989b, 1994, 1995)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分析所不强调的方面。他强调的是当时政治条件、短期变化在政治机会中的重要性,它们可以发动政治抗议,也可以促成

其衰退。短期内会变化的政治背景的因素，包括了参与通道的开放性、支配性结盟的改变、有影响的联盟的可利用性，以及精英内部的分化。我们将集中考虑变化着的政治背景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对于构成本书研究对象的那类运动是特别相关的：左派的力量构造和政府中是否有左派。

政治机会结构的这四种组成部分或多或少是系统地互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坚持认为，联盟结构至少部分地是由政治机会结构的三种更稳定的组成部分决定的。就后者而言，我们预先假定，分化结构构成政治背景的最一般和最稳定的方面。它们促成了主导战略的发展，而主导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又被有形地制度化了^①(图 1 左边概括了这些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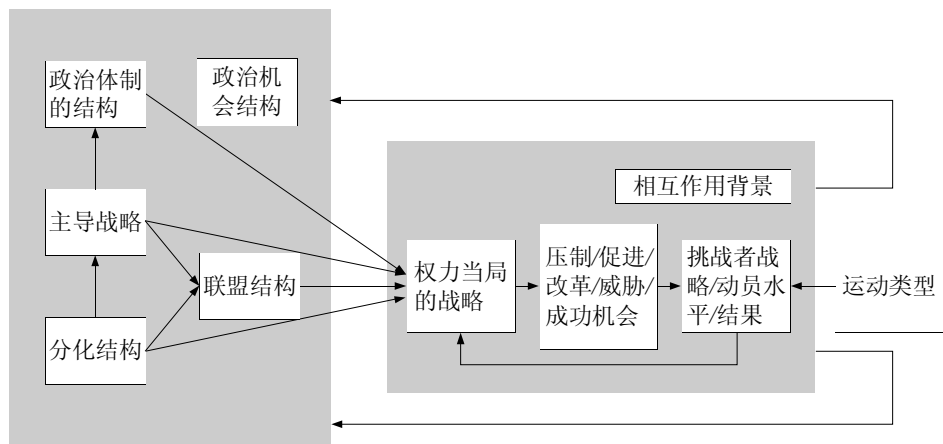


图 1 政治背景及其对社会运动动员影响的模式

运用政治机会结构方式的作者，并不总是很清楚政治背景的结构特征如何影响集体行动者的动员。为了理解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把政治机会结构的宏观结构层次

^①那些熟悉我们以前的著作(克里西 1991, 克里西等 1992)的人将注意到，我们给我们的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中起初包括的其他三种组成部分增添了“民族分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样做时，我们沿用了库普曼斯(1992a)提出的概念分析。此外，以前使用的“力量构造”概念在目前的模式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说明。在那里，它被“联盟结构”的概念所取代。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

New Social Movemen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同运动行动者的集体行动联系起来的机制。在“相互作用背景”的总标题下,我们提出了一些旨在连接政治背景和动员过程之间的鸿沟的概念。根据我们的概念,在社会运动的动员方面,政治机会结构的诸因素共同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成员特别是政治权力当局战略。这些战略意味着一个国家特有的对运动动员的促进或压制、它们成功的机会和它们不得不估计的改革或威胁的程度之混合。这种特殊的混合规定着一个既定社会运动的具体机会。通过表明一个运动动员的代价和收益,这些具体的机会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运动本身的战略、它的动员的水平和动员过程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在这种“因果漏斗”的基础上去解释动员的过程。至少三点考虑限制着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范围:(1)具体机会对于一个挑战性运动的动员战略的后果,依赖于这一运动起工具作用的程度。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论证的,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运动——工具的、亚文化的和反文化的——它们对政治机会结构所界定的具体机会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2)一旦动员过程发动起来,社会运动所采取的战略将对权力当局采取的战略具有反馈的效果。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将靠自身的动力建立起来。(3)正如塔罗(1994, 1995)所专门强调的,取决于动员过程的规模和有关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可以认为相互作用的动力将创造它们自己的机会,改变政治机会结构——在联盟结构的层次上,或者更深远地,在体制结构、主导战略和分化结构的层次上。图1的右边概括了这些考虑:这个图的最右边引入运动类型作为一个外生的因素,而反馈过程则用箭头表明反作用于政治机会结构,反作用于权力当局的战略。这就完善了关于我们的政治背景及其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的模式表述。

我们并不坚持认为,这种模式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目前的模式预先假定了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政治制度和对于其环境的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这两个先决条件多少适用于我们在本书打算研究的那个世界的时期和地区——1975~1989年的西欧。在这一时

期,西欧国家的国家分化结构、主导战略和体制框架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东欧发生的事情相比较,肯定是如此。诚然,所说的这个时期,是西欧日渐一体化为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或者如 1993 年马斯赫利特条约签署以来所说的欧洲联盟的时期。此外,正如我们以前的关于和平运动的大规模示威的例子所说明的,社会运动的动员受到了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不仅在西欧,而且也在整个世界。但如果在全球化的一个阶段,民族的政治背景对解释和说明社会运动的动员肯定越来越不重要(塔罗 1995),我们仍坚持认为,民族背景对理解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动员仍然是决定性的。我们在一开始引入的和平运动的动员的例子中的跨国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民族的政治背景的确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新社会运动

在考虑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所有动员起来的运动的抗议事件时,我们的研究集中注意的是西欧国家社会运动领域的一个特殊部分: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既然我们负责任地看待这一时期西欧发生的大部分动员,这些运动就对研究集体行动特别有益。根据麦卡锡和扎尔德(1977)的概念分析,它们构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产业”,或如德拉·波尔塔和鲁赫特(1991)偏爱叫做运动群一样,构成了一种特别的“运动家族”。这一家族包括生态学运动(有其反核能的分支)、妇女运动、擅自占地者运动,以及其他各种为被歧视的少数派权利而动员的运动(如同性恋者运动)。曾有众多尝试来说明构成这一运动家族的所有运动的公分母。尽管我们并不想进入这些理论讨论的细节,但我们考虑在表达我们研究的不同方面之前,说明一下我们的观点是

导

我们同意拉斯科(1985: 413)的观点,一个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是由它在社会结构中的主要选民的地位构成的。而且,我们也和他一样

论